

專論篇導言

黃俊傑

本書「專論篇」收錄國人論述專史研究方法之文字共十二篇，分從各個不同的領域論述研究方法之運用。第十五篇論述之主題為「社會科學中的歷史解釋」，全文採取社會科學之角度，就歷史解釋之性質、類型及邏輯，作系統性之分析。(第十六篇則論述史學研究與社會學概念及方法的相關性。這兩篇論文均涉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關係，此係史學方法論一大重要課題，值得吾人再略加討論。社會科學包括許多不同學科，吾人在此僅以社會學為例加以說明。)討論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間關係，不可避免必須涉及兩個學科的異同。自從民國十年何炳松氏譯美國史家魯賓遜之「新史學」一書為中文以後，魯氏呼籲史學與社會科學合作之言論逐漸為國人所習知，然兩者之異同問題遂亦一併引起國人之注意，編者在本書「通論篇」導言中即指出何炳松氏與朱謙之氏對此一問題看法之出入。通說以後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大差異不外以下二節：一是史學研究所注重者在於人類活動之發展順序及其過程，而社會學研究則探討人類活動發展之型態及其轉變。前者重其縱剖面的連續，其關心之焦點在事件之「變」與「常」；後者重其橫切面之比較，其關心之焦點在事件之「類」與「型」。此其一。二是史學研究冀圖釐清人類行為之因果關係，故其重點在「過去」，在個案之分析；而社會學研究則企圖建立人類行為之普遍模式，故

其重點在「現在」，在通則之建立。前者之特殊關切在特殊性，後者之特殊關切在普遍性。以上二種關於史學與社會學之差異的說法均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吾人細繹其說，思考史學與社會學之異同，則覺兩者間之歧異者其細節，兩者間之同調者其大經大脈。蓋因史學研究雖重事件之順序及其過程，但對事件之型態及其轉變並非絕不措意。十九世紀初年主持復興柏林大學的德國大哲洪保德（Wilhelm V. Humboldt, 1767-1825）在一篇著名的「論歷史家的責任」（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¹⁾的文字中嘗云：①

如果歷史家僅照外面所表現地，一件一件地，將各事件的特殊情況予以描寫；如果歷史家不能把事件的內部聯繫給自己精密地解釋出來，不能創出自己對於活動力量的見解，不能正確地認識那些力量在某一定瞬間所取的定向，不能將見解方向二者聯合以與同時的情況以及過去的種種變化下一番的探究；那麼歷史家只好像素描家似的產生一些漫畫之類的東西罷了。

洪氏在哲學上之唯心論傾向吾人在此可存而不論，然洪氏上文之見解與吾國史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理想並無二致。太史公寫伯夷列傳，敘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②的行爲過程，但太史公也關切這個事件在人類行為型態中所代表的意義，所以他才會接著討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可信性這個問題。自史記以降，中國傳統史學中歷代正史的作者以叢傳的方式把儒林、循吏、酷吏、貨殖、游俠、佞幸、外戚、帝王、武將、姦臣……等各種歷史人物分類敘述，這是一種具體的對於歷史人物與事件的類型所作的探討。雖然以今日社會學的眼光來看，這種分類在類型學（typology）上也許尚嫌粗疏，但是這也足以說明史學研究不僅重視人與事發展過程中的「變」與「常」。

」，也有心於探討人與事演變過程中的「類」與「型」。這一點不僅見之於傳統中國史學，也見之於西洋史學。例如西元第二世紀傳記家普魯塔克 (Plutarch, Ca.46?-126?) 著「對比傳記」^③一書，敍述希臘羅馬史上所見之重要歷史人物，並取一位希臘史上之人物與一位行誼近似之羅馬史上之人物合而觀之，較其異同，如以費比亞斯·麥克西瑪斯 (Fabius Maximus) 比之於柏里克里斯 (Pericles, C.495-429 B.C.)，以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384-322 B.C.) 比之於西塞羅 (Cicero, 106-43 B.C.)，凡此皆係有一類型之觀念為之前導。由此可見，史學與社會學在類型研究上之差異僅可謂為程度上之差別而非性質上之重大不同也。^④

其次，關於史學研究與社會學研究之差別在於特殊性之探討與普遍性之建立這種說法亦嫌言過其實。這種說法可以上溯到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⑤ 亞氏在「詩學」一書中嘗云：

歷史家所描述者為已發生之事，而詩人所描述者為可能發生之事，故詩比歷史更哲學與更莊重；蓋詩所陳述者毋寧為具有普遍性質者，而歷史所陳述者則為特殊的。

亞里斯多德這種說法在今日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界仍屢見不鮮。吾人細按其實，這種說法其實忽略了史學研究從對事物的特殊性的探討到建立普遍性原則的動態過程。前舉太史公寫「伯夷列傳」之例足可說明此事實。「太史公希望透過對伯夷、叔齊此一「特殊」個案之反省而對人生價值信仰之困惑求得一「普遍」之解決。希羅多德 (Herodotus, 484-429 B.C.) 寫「波希戰史」一書鋪敍波希戰爭（西元前四九〇—四八〇）此一「特殊」事件，然其最終目的乃在於建一己之歷史哲學，企圖在「特殊」事件與「普遍」

「知識之間建立一道永恆的橋樑。推而廣之，吾國史學上所見兩漢書之「論贊」，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資治通鑑」中之「臣光曰」，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讀通鑑論」及「宋論」中之史論，均努力於從個別的人物或事件中歸納或抽離出普遍之原則，以追求整體性之歷史知識。

由上文之討論可知，史學與社會學皆以「人」為其探討之對象，兩者之間有側重點之不同，而無根本性質之差異。至於所探討之對象一為「過去」一為「現在」此種說法尤不值一駁。英國史學家崔微·魯波（H.R. Trevor-Roper）在一篇論述史學與社會學關係的講辭中即會指出，「過去」與「現在」乃係不可分割之連續體，史學研究「過去」，社會學研究「現在」，但是兩者實不分為兩橛。社會學家欲建立「模式」，最有效之辦法即將其「模式」與人類歷史所見之經驗相印證。因此，魯氏大力鼓吹歷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⑥。晚近歐美學界對於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持論頗為一致，幾已成為人人共諭之義。如著名的美國經濟史大師寇克蘭（Thomas C. Cochram, 1902）即指出傳統的敘述式史學作品有其限制，而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正是解決歷史的綜合這個問題的不二法門⑦。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亦認為社會科學的基本發現、學術關懷及其學科的視野對史學研究均大有助益，有助於史學的敘述性作品及專論性作品在寫作方式上的突破⑧。

以上簡論史學與社會學在基本性質上之相近，以作為吾人思考史學與社會學關係之張本。以下再取學術史之立場回顧社會學此一學科近百年來之發展及其研究方法論之演變，以作為吾人閱讀本書第十五、十六兩篇論文之背景。

自十九世紀初年近代社會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以後，其所關懷之主要重點大致不出以下二項：一是

對人類社會作巨視的社會學分析；一是對人類社會及文明作比較研究。由於此種巨視的研究傾向，近代社會學遂以以下三項問題為主要的研究之焦點：一是關於社會及社會秩序的一般特徵之分析；二是對各種社會及制度型態作比較分析，尤其集中於研究近代社會之特殊性；三是對於人類社會之諸般不同型態從社會力量或機械論之立場給予解釋。針對以上這三大問題，近代社會學家採取何種研究途徑來進行研究並提出解釋？自學術史之立場，吾人可指出，其流派大勢之所趨不外以下之二途：一是早期的演化論的研究途徑 (Evolutionary Approach)。早期的社會學工作者均企圖透過對人類社會與文化之比較及研究中指出其演化發展上之共同階段。此種研究傾向通貫孔德 (August Comte, 1798-1857)、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馬克斯 (Karl Marx, 1818-1883) 以及稍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如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1826-1877)、孫末楠 (W. G. Sumner, 1840-1910) 以及心理學派演化論者如華德 (L. F. Ward, 1841-1913) 等均顯然可見而成爲早期社會學理論之重大特徵。此下演化論的研究途徑漸爲學界所不滿，若干學者努力於把演化論的研究途徑與巨視的比較研究方法加以綜合，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卽爲此一學風轉變時期之代表性人物。

一是出現於二十世紀初年的比較研究途徑 (Comparative approach)。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推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韋伯爲近代學界之通儒，其學術之領域極爲廣闊，不僅在中西歷史研究均有原創性之貢獻❶，在社會學領域尤尤爲一代之宗師。韋伯採取比較研究之途徑，畢生追索一個大問題：一是，近代社會特質何在？換言之，近代社會與前近代社會有何差異？二是，何以近代社會之特徵諸如資本主義、理性的官僚制度等等僅見於歐洲？近代歐洲社會所見之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官僚制度

化 (bureaucratization) 及神話的解消 (denystification) 等發展趨勢是否為人類社會之普遍現象或僅為近代社會之特殊面貌？韋伯一生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均在不同程度之內與以上二大學術關懷互有關聯。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韋伯所開創的此種比較研究途徑有再興之趨勢，然其所關懷之間題意識略有不同。一般說來，歐洲社會學界較重理論之拓展，美國社會學界則較重所謂「經驗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然戰後數十年間歐美社會學界似有一共同關懷之新問題，則即是：如何使所謂「未開發國家」成為「已開發國家」？此一研究上的問題意識幾見於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如經濟學界之計量經濟學、政治學界之政治系統論，社會學界之人口學、區位學……等新興研究趨勢均著重於援用新方法及分析工具來探討此一大的時代問題。當代社會學大師埃森西塔 (S.N. Eisenstadt) 稱此一新的研究趨勢為「系統研究途徑」("systemic" approach) 而推許帕深思 (Talcott Parsons)、阿爾蒙 (Gabrial Almond) 及伊斯坦頓 (David Easton) 等為代表人物¹⁰。此種所謂「系統研究途徑」即是把人類的社會或政治活動視為一個自我完足之「系統」，認為此一「系統」是一個實體，此一實體與其所自生之環境不同，自有其界限，亦自有其機構以維持其系統之持續性及自主性。

此種「系統研究途徑」與關於所謂「第三世界」之研究相結合，為現代社會學提出了許多嶄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尤以「傳統社會」及「近代社會」之異同為其主要關懷焦點。社會學家對於這類問題的探討，有了豐碩的成果，這就是一九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興起的所謂「發展社會學」¹¹。發展社會學的新視野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許多思考歷史問題的新方向，也對史學家提出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對於近代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刺激尤大，許多以西文撰寫的中國近代史論著均環繞「傳統—現代」這個主

題即爲此種學術刺激最明確之說明。此類成果國內介紹甚多，人人耳熟能詳，吾人在此不再贅及。然則此種發展社會學之研究無論在意識型態上，在經驗上，乃至在方法論上均有值得商榷之處，而其尤爲嚴重之限制則集中於以下二端。

一是缺乏歷史的眼光而且看問題多以歐洲爲中心 (*ahistoricity* and *Eurocentricity*)，無形中遂以歐洲近代發展之經驗作爲人類社會之普遍模式；二是過份機械式地強調「傳統」與「現代」的二分觀念 (*tradition-modernity dichotomy*)，未流所及遂無形中以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爲不相聯屬之敵體^⑫。針對上述研究上的盲點，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漸有學者起而糾正。如埃森西塔所提出的「後期傳統社會」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的觀念以及把政治系統論 (*political system*) 的理論運用來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官僚帝國^⑬，皆係有見於此種研究途徑所出現的問題而欲起而矯正之所作的努力。

吾人上文對社會學發展所作冗長之介紹，一則在於釐清近百年來社會學學術傳統所見研究方法之變遷，以作爲吾人從事歷史思考之一助緣，使史學工作者自社會學的研究視野及研究方法中汲取靈感。二則在於透過對晚近社會學研究盲點的反省來恢宏史學工作者之胸襟，增益史學工作者之志氣。本書選輯第十五、十六兩篇論文皆呼籲史學與社會學之結合，皆鼓吹史學工作者勇於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然則此非意味史學研究工作應淪爲社會科學之婢女。事實上，今日若十社會學作品缺乏歷史之深度久已成爲人所詬病之事實，史學工作者對於社會學界此種缺陷可能而且必須作最大限度之矯治。史學工作者在吸收社會學的豐富營養之同時，亦應有此種認識與抱負。

本書第十七、十八及十九三篇論文均涉及歷史哲學之間題，此一問題本不屬狹義的史學方法之範圍

，但歷史哲學涉及歷史解釋，亦爲吾人所當關心。晚近歐美歷史哲學之發展可大別爲二大陣營：一是「玄想的歷史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是「批評的歷史哲學」(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後一派又可細分爲歷史的觀念論與分析的歷史哲學兩個支流，余英時先生嘗著文介紹批評派與玄想派歷史哲學之分別云：¹⁴

批評派歷史哲學不同於玄想的歷史哲學之處最根本的在於前者所注重的乃在於歷史知識之成立如何可能，換言之，即我們怎樣才能確定過去所發生過的事實爲真實不虛，而後者則注重歷史事件之本身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具有何種意義，並如何能解釋全部歷史進程爲一必然之歸趨。此語最能道出二派涇渭分流之所在。

黃進興先生「『分析歷史哲學』的形成與發展」及郭博文先生「歷史的觀念論」這兩篇文字即分別介紹「批評的歷史哲學」此一學術潮流中的兩個支流¹⁵。本書第十九篇論文「湯恩比的史學方法及觀念」一文則討論本世紀最著的玄想派歷史哲學家湯恩比的史學思想。湯恩比的歷史哲學體系龐大，其「歷史之研究」巨著風行戰後英語世界（尤其是美國），國內介紹湯氏學說者自一九五〇年代張貴永先生以降亦頗不乏人。然湯氏及其所代表的玄想派歷史哲學因有「論」多於「史」之病，每爲史學界同仁所詬病，英國史學界大師崔微·魯波 (H.R. Trevor-Roper) 以及荷蘭史學家海爾 (Pieter Geyl) 均嘗著文指出湯氏史學之缺陷。晚近歐美學界「批評的歷史哲學」興起，湯氏學說益顯沒落。以今日之立場言，吾人如謂湯氏學說所具者僅係學術史之意義殆不爲過。然則，本書仍選輯論述湯氏史學之文字，尚有一重要之用意在焉。湯氏一生治史一貫採取世界史之立場來看問題，其所著「歷史之研究」一書容或不無架空

及先驗主義之病，然其論史橫跨中西上下數千年，此種氣魄相對於群趨專題研究，見樹不見林之當代學風而言，仍具有某種程度之啓示作用。湯氏晚年（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在「自由歐洲廣播電台」

(Radio Free Europe) 與史學家爾本 (G. R. Urban) 曾作十二次廣播對話，反省一生治史歷程及論史觀點。湯氏回憶早年在牛津大學攻讀希臘羅馬史，後雖未成爲古史專家，然其治史方法頗受古希臘史學家波利比阿斯 (Polybius, 201-120, B.C.) 之啓發。波利比阿斯一反其前輩重視片段插曲故事之作風，轉而以探討整體性的觀點對他影響極深^⑯，遂形成他一生治史之基本取向。湯氏此一晚年反省之言，對吾人極具啟發價值。吾人對湯氏之歷史哲學儘可有仁智之見，然湯氏治史之眼光及胸襟對史學工作者而言則仍有其參考價值也。

本書第二十、二十一及二十二等三篇論文討論思想史及宗教史之研究方法，而宗教史亦可視為廣義傳統史學中歷代正史有「儒林傳」及「藝文志」之體裁，敍述一代學術源流及其代表人物；亦有「學案」、「體裁」之著述（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論次歷代大儒之師承、講友、學侶、同調及其門人，頗能見一代及一家學術之淵源發展，然則此類著述所論者多屬「學術史」之範疇，而與「思想史」相去較遠。相對於吾國之「學術史」，西方學界之「哲學史」研究素稱發達。然彼所謂「哲學史」研究多以哲學家之玄思爲其探討之焦點，其主要任務在釐清哲學體系之結構及各家哲學之傳承演變及其發展，對於哲學所自生之通盤歷史背景殊少考慮。另一方面，以分析哲學見長之哲學家則又起而倡導所謂

「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意圖拆碎哲學體系的七寶樓台，而追溯「單位觀念」之發展，此種「觀念史」研究方法雖較能窮一家哲思之精微，然因其將「觀念」抽離於歷史文化脈絡之外來考慮，其所造成之流弊亦久為人所共見。本書第二十篇論文：「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一文作者李弘祺先生即係有見於上述「哲學史」與「觀念史」研究方法上之限制而思有以克服之，李氏指出他所謂「通盤思想史的歷史研究」的課題乃在於「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一個自足的立足點，以便用歷史的眼光點化複雜紛糾的思想層面，使它們能通過歷史演變的脈絡而井然有序地呈現出來。」吾人細繹李氏全文之論旨，殆可發現李氏欲以「通史精神」來掌握個人的及事件的思想史之研究。此「通史精神」四字亦即是「通盤思想史的歷史研究」與傳統的「哲學史」及新興的「觀念史」根本分野之所在。在吾人思考思想史研究的自主性之今日，李氏之論點頗值吾人深思。

第二十一篇論文：「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全文論述之內容即在於介紹近數十年來歐美思想史方法論之二大主流及其研究方法，指出不論「觀念史」或「思想史」研究法均有其長，亦有其短。就史學研究之根本性質言，「資料先於方法」實為人人共許之義。職是之故，任何方法論均必須通過史料之疏解而建立，否則終不免架空議論之譏也。這篇文字所介紹者多係歐美思想史家之言論，吾人所以選入本書實取其可以為吾人思考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助緣。當代中外學人論述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論之文字亦為數不少¹⁷，如取而與本文所介紹之歐美學人言論並觀，當可收相輔相成之效也。

本書其餘四篇論文分別討論史學研究中較新的四個研究領域：心理史學 (psychohistory)、量化史學 (quantitative history)、經濟史及歷史人口學 (historical demography)。這四個研究領域過去國內介紹

較少，故本書特選輯最近國人有關此四方面問題之中文論述文字四篇，以見其發展之一般趨勢。以下僅就編者知見所及，嘗試簡介這四個研究領域之一般狀況，以作為讀者閱讀此四篇論文之參考。

就其學術源流而言，心理史學雖可上溯到十八世紀的維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 及赫德 (J. G. Von Herder, 1744-1803) 的作品，但是使心理分析的理論真正對史學研究產生影響力的則要推本世紀的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弗氏把「個人」與「社會」視為對立之敵體以及強調人類行為之非理面雖飽受學界之攻擊，然弗氏對二十世紀史學研究之衝擊至深且鉅則是人人共見之事實。英國史學家卡爾 (E. H. Carr, 1892-) 嘗指出，弗洛伊德對二十世紀史學家而言有兩項重大之意義：一是弗氏根本推翻過去以為人的行為動機可以充分解釋人類行為的說法，並進而以心理分析之方法解釋歷史上之重要人物的行為；二是弗氏提醒史學家在從事研究工作時多反省自己以及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¹⁸。弗氏以降，對心理史學貢獻最大者當推哈佛名教授艾里遜 (Erik H. Erikson)。艾氏以所謂「認同危機」(參看張玉法教授「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文中之介紹)之說來研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與甘地 (Mohandas Gandhi)¹⁹，成為心理史學的經典之作。艾氏論馬丁路德之作品對學界造成巨大衝擊，並引起廣泛之討論²⁰。

在史學界中，首次起而呼籲史學工作同仁重視心理歷史研究者則是一九五七年度美國歷史學會會長蘭格 (William L. Langer, 1896--)。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國歷史學會在紐約市召開年會，蘭氏以「歷史研究的新課題」²¹為題發表會長演說辭，呼籲史學工作者援用當代心理分析的技術以及新的心理學說如「動力」 (dynamics) 或「深度心理學」 (depth psychology) 之類理論來從事歷史研究。蘭氏並預

言：「現代心理學將在歷史解釋上一定會佔有更重大的角色」²²。揆諸近二十餘年來歐美史學界有關心理史學豐碩之研究成果²³，蘭氏之預言已完全證實。根據一九七六年的一項調查，全美約有三十所大專院校開設「心理史學」之課程²⁴。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耶魯大學、堪薩斯州立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斯頓大學等校在歷史學的博士課程中也都有「心理史學」之設置。一九七三年，《Childhood Quarterly》創刊，接著「心理史學評論」(*The Psychohistory Review*)問世，此為此一研究領域之專攻刊物。其餘如「美國史學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近代史學報」(*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科際史學報」(*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等均常刊出心理史學之論文。

雖然「心理史學」課程逐漸受到大學之重視，亦逐漸成為研究院博士課程之一項重要分科，雖然以心理分析方法及眼光所撰寫史學作品之出現亦已如雨後春筍，但「心理史學」在史學研究中之地位仍聚訟紛紜，言人人殊，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持平之論尙不多見。就反對者而言，博學如巴拉克勞甫 (Geoffrey Barraclough) 尚發「心理史學乃是空談」的議論²⁵，其餘識見胸襟不及巴氏者則眞斥「心理史學」為毒蛇猛獸矣。少數年青一代學人或呼籲應以穩健之態度從事「心理史學」之研究²⁶，甚至亦有人懷疑「心理史學」之作品是否真正之史學作品²⁷。反之，贊成「心理史學」者則稱道鼓吹之不遺餘力，其最具代表性之言論則首推著名心理史家羅溫堡 (Peter Leowenberg) 氏本年（一九八〇年）在回顧美國史學界「心理史學」研究成果時所云：²⁸

心理史學為史學家提供了新的工具，以便分析史料以及往史所見人類行為的複雜形貌。……對以後

數十年的史家而言，（心理史學）使他們得以用一個比我們更複雜的方法來解釋人類的過去以及現在的困局。

當然，在當今學界裡執兩用中，持論穩健者亦有其人，其言論，國內過去亦均有中文譯介²⁹，吾人此處不再贅及。

「心理史學」在當今史學家雖未能取得一致之評價，然國人亦頗有運用心理分析之觀驗以從事史學研究者，其所獲致之成果頗值吾人注意。例如張瑞德先生嘗援用心理學家李溫（Kurt Lewin）有關心理上所謂「雙趨衝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之理論來解釋蔣夢麟（1886-1964）早年心理上的價值衝突及其平衡，頗饒新意³⁰。由於加上了心理分析的層次，張氏對蔣夢麟之研究相對於其他之中國近代史論著言較能見出問題之複雜性，其分析亦遠非一般環繞「中西衝突」「傳統—近代衝突」或「文化認同危機」等主題立論之中國近代史論著所能同日而語。

國人擷受艾理遜之「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理論以從事思想史研究者則首推余英時教授。余氏採思想史之立場，以戴震（1724-1777）及章學誠（1738-1801）為中心，討論清學之歷史意義³¹，其研究取徑與梁任公、胡適之兩先生之從方法論觀點理解清學頗不相同。余先生從心理分析的觀點研究章實齋早年的認同危機，認為實齋從十五、六歲到二十八、九歲之間，曾經為了找尋學術上的真義而作過種種努力，這種危機感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乾隆丙戌（一七六六年），實齋初晤東原，此時正是實齋一生「認同危機」發展至最緊要關頭之時期，故東原之考證挑戰始能在實齋心理上引起巨大回響，並因此而逼使實齋在此後數年之間克服心理上的危機³²。余先生由實齋心理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來解釋其「六經皆

史」說及「朱陸異同」論的提出，其說極具創見，發前人所未發，殆可視為以「心理史學」之眼光治吾國思想史之一典範。余先生所提出的關於清代學問之歷史意義在於儒家知識主義之興起這種說法雖未必獲得學界一致之贊同^⑬，然就其方法論立場言，則余先生之研究結合「心理史學」與思想史，在傳統思想史研究法之外另闢蹊徑，其功正有足多者也。在史學研究的原野上，任何新方法的運用必然佈滿荆棘，「心理史學」研究法所面臨之困難尤多，惟其所以深具挑戰性，原因亦在於此。

本書第二十四篇論文討論史學之量化及其問題。所謂「量化史學」一如「心理史學」，亦為晚近史學界衆說紛紜，爭執甚多之一新研究方法，但史家提出以統計方法來駕御煩雜的史料的呼籲則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年。一八九〇年代美國史家賈納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已開量化研究之風氣；吾國史學前輩梁啟超、丁文江 (1887-1936) 等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亦均倡導以統計學治史^⑭。但是，大力抨擊「印象式的」 ('impressionistic') 歷史寫作並把史學的量化研究作為一個方法學提出的則是美國史學家邊森 (Lee Benson)。一九五七年邊森氏著文呼籲量化史學之建立^⑮，經濟史家響應最力，結果在一九六〇年所謂「計量經濟史學家」 ('cliometricians') 初次召開了學術性的會議，研討量化史學問題。自此以下，量化史學飛躍發展，以量化方法寫成的史學論文幾佔據重要的科際性學報如「經濟史學報」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社會史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史學方法學報」 (*Historical Methods*)，創刊於一九六七年）、及「科際史學報」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創辦於一九七〇年等刊物的主要篇幅。美國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艾狄洛特 (William O. Aydelott) 教授提倡「量化史學」尤力，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的五年之間，參加由

艾氏所主持的史料分析的暑期研討會的史學工作者合計就有一百二十人。^① 關於「量化史學」在近二十年來的進展，從各大學術性刊物所載論文中所附圖表數量之增加最易窺其大勢之所趨。量化史家柯瑟(J. Morgan Kousser)最近曾對歐美若干重要學術性史學刊物作過精審的量化分析，頗能見其發展傾向。

根據柯氏之研究，美國境內所發行五種包括各範圍的史學刊物（包括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及 William and

Quarterly）中所載論文所附圖表有顯著增加之現象。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間，以上這五種刊物中有三種平均每一百頁可刊載之圖表數目在一〇之下。通整個一九六〇年代，在這五種刊物總共四十五個年次中有十三個年次無任何圖表列出。但至一九七〇年以降則學風丕變，一九七〇年代這些刊物平均每二百頁就有至少一個圖表，此種發展趨勢與時俱進，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之間圖表出現的總平均數正好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間總平均數的五倍。^② 柯氏又分析另外五種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經濟史專業刊物（包括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Annals: Economic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及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und-Wirtschaftsgeschichte）中圖表的出現數量，結果發現在以上這種專業性刊物中圖表的出現次數均較前述五種一般性研究報為高，其中尤以「經濟史學報」最高。^③ 而出版於西德及法國的學報中，圖表之廣泛出現也證實了史學研究中的「量化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 也已廣及歐陸。以量化方法所撰寫的論著在國內雖尚不多見，但有關量化史學的理論則頗已有人從事介紹。^④

如上起述，量化史學在近二十年來雖有可觀之進展，但關於此一研究方法之價值，學界仍無定論。

贊成與反對雙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這除了因為史學工作者個人治學態度有保守與開放的差別之外，也因為量化史學牽涉到許多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所致。正如法國史學家福瑞（François Furet, 1927-）所指出的，量化史學至少牽涉到三個重大問題：一是史家處理史料的方法；二是若干史家（特別是經濟史家）企圖把史學變成爲計量經濟學的問題；三是歷史現象中時間層次研究的問題⁴⁰。而這些問題一時都不易有人人能共同接受的結論。因此，對於量化史家之看法乃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提倡史學量化研究最力的艾提洛特氏嘗云：「……量化在我們現有經驗的注視之下，仍舊還是一個歷史分析有力的工具。它使研究工作更容易，更可靠，在某些方面，又提供了用其他方法無法下手的研究問題。」⁴¹另一位著名的量化史學家邊森（Lee Benson）則宣稱史學研究工作之目的乃在於發現人類行爲之通則，史學工作者對人類過去之行爲可以作科學的研究。他認爲量化史家可以成爲「真正的科學的史學」（"genuinely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⁴²。此外，贊成量化史學者持論多與邊氏相近⁴³，茲不具引。但是，在史學界反對量化史學的聲浪亦大，而且反對最力者多爲極具成就之大師。例如斯勒辛吉（Arthur Schlesinger, Jr.）就說，量化方法並不是通往社會智慧最主要的途徑，它是一條弱點很多的途徑，「因爲最重要的問題是不能有量化的答案的。」⁴⁴ 赫克斯特（J.H. Hexter）則斥之尤不留餘地，赫氏云：「近年來所謂歷史學中的佳音來自量化研究及社會科學這種說法在事實上不誤，但是在理論上則大錯。」⁴⁵ 哈佛大學的韓德林（Oscar Handlin）教授去年（一九七九年）在一篇反省史學研究的危機的論文中曾說，以量化方法治史所得不償其所失。從布林頓（Crane Brinton）的 The Jacobins（出版於一九三〇年）問世到梯利（Charles H. Tilly）的 The Vendée（出版於一九六四年）這三十四年間，方法的複雜性雖有增加，但是基本的觀點

則無改變。韓氏並指出，在史學研究上更詳細的陳述不一定就是更精確的陳述^①。因此，他反對講求量化研究法。

量化研究法在當今歐美史學界之評價不一者有若是。則吾人應持何種態度以對待此一新興研究方法？此爲一耐人尋味之問題。欲回答此問題，請先自一本論述春秋戰國史之著作說起：許倬雲教授著「先秦社會史論」^②。春秋戰國時代五百年間乃國史一大變局，君子陵夷，小人上升；布衣得爲將相，寒素躍爲公卿。對於此一歷史現象，吾國古籍指陳頗多，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③，左傳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④均指此一時代變局而言。然則此一變局如何產生？變動幅度多大？此種變動與社會結構有何關係？凡此均爲探討此期歷史之重大問題而中外學界迄無詳贍之論述。許倬雲教授「先秦社會史論」一書即爲分析此一歷史現象而作。就方法論之立場，該書受韋伯及涂爾幹社會學理論影響最深，故以韋伯方法學中之「理想型」(Ideal Type)爲比較研究之分析工具，並以功能主義之觀點分析各個歷史現象間之函數關係。然古史資料不足，史文有闕，如何駕御史料進行分析，乃成爲研究方法上之根本課題。許教授在此書解決此一問題之方法是採用量化之分析，製成四張統計表：①春秋時代社會階層統計表；②卿大夫集團重要性激增之統計表；③大家族卿大夫集中表；④春秋戰國時代寒微出身人物統計表。這四份量化圖表之製作程序如下：作者從班固前漢書中的「古今人表」所載一九九八個人名中，選出見之於左傳的五一六個作為統計分析上之「任意選樣」(Random samples)，再依其出身背景把這五六六個人分屬於三個社會階層：公子集團、卿大夫集團、士集團。作者把春秋時代分爲九期，每期三十年，在五百十六個選樣中，屬卿大夫集團者佔三百三十五人，即百分之六十五。在這三百三十五人

中，在政治上活躍者占二百十八人。作者在第四表的分析中指出，春秋時代寒微出身人物占百分之二十六，至戰國時代則激增至百分之五十五⁵⁰。許先生以量化方法分析春秋戰國時代社會變動及戰爭頻率，學界同仁雖有若干異議⁵¹，然純就方法學之觀點言，則許著以簡御繁，以數張量化圖表說明錯綜複雜之史實於精簡的篇幅之中，實為重大之學術成就。吾人如謂史學研究之根本要義在於通覽時變，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則許著對春秋戰國史之「常」與「變」之析論實有可觀之成就。此書突破前此學界對先秦古史所作之「印象式」("impressionistic")論述方式，使先秦隱晦之古史展開清晰之面貌。由此可見，「量化史學」雖仍有諸多問題存在，然如運用得體，並輔充分之個案研究，則量化分析對史學工作者言仍將有一定程度之貢獻。

本書第二十五篇討論經濟史之新趨勢。經濟理論及數量方法之運用為近二十年來新經濟史研究與傳統經濟史研究基本差異之所在。所謂「新經濟史」(New Economic History)作為一個嶄新的學科大約出現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就研究方法言，新經濟史研究有二大特點：一是大量的統計資料之運用；二是以反事實(counterfactual)之假定為推論之前提。在此種研究方法支配之下，近二十年來美國史學界的新經濟史家對美國史上之奴隸制度、內戰及鐵路等問題均有深入之研究⁵²。新經濟史研究與傳統經濟史研究之重大差別在於前者常援用建立在「模型」(model)之上的經濟理論來分析人類過去的經濟活動。所以，新經濟史自始即面對經濟史實與經濟理論兩者間之平衡之問題⁵³。傳統經濟史家之反對新經濟史除了因為對新經濟史家所使用之方法及理論之陌生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反對新經濟史家以「論」代「史」之作風。美國史學家考特(W. H. Court)嘗抨擊此類研究云：「人生失足誤蹈固十常八九，而

最深切的錯誤恐怕莫過於以理論取代生命，以抽象觀念代替歷史事實；最遺憾的是芸芸衆生對大而無當的理論却深信不疑，而且身體力行之。」⁵⁰ 考特氏之言代表一個具有濃厚的人文學色彩的傳統經濟學者對新經濟史研究的反應，其言頗值持論激越之前進學人三思。吾人選錄「經濟史研究的新趨向」一文，其意並不在於在新經濟史家與傳統經濟史家的爭執之中取一立場，是朱而非紫。本書選錄此文乃在於提供革新之角度，以增益吾人思考經濟史現象之能力也。

本書最後一篇論文介紹歐美學界近二十年來歷史人口學之發展。「歷史人口學」在國內學界尚屬一革新之研究領域，中央研究院劉翠溶教授近年來提倡此一研究最力。就史學研究之立場言，歷史人口學之所以特值吾人重視不僅因為人口學事實上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一種關於史料之思考方式，更因為通過一般人之生命現象來探討社會經濟變遷實乃通往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及法國年鑑學派⁵¹ 所揭橥的「整體歷史」(histoire totale) 的理想之最佳途徑⁵²。就中國史學傳統而言，歷史人口學之研究尤具有深刻之學術意義，蓋因中國歷代官修正史每多詳於帝王將相之事蹟與夫英雄豪傑之偉業，於一般平民之生活轉較忽略，此所以梁任公先生譏傳統史學的「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也。歷史人口學之研究將可彌補中國傳統史學中此一嚴重缺憾，並為明日之中國史學研究綻放異彩，再創新局。此則吾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見：洪保德著，崔亮譯，「論歷史家的責任⁽¹⁾」，中德學報，第六卷第一、二期（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頁三二一。

史記（台北：泰順書局影印新校標點本），卷六十二，伯夷列傳第一，[卷]一一一。

③ Plutarch, John Dryden & Revised by A.H. Cloug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reprinted from the 1864 edition) 此書部份內容已譯成中文：

吳奚真譯，希臘羅馬名人傳（台北：國立編譯館，一九六三）。

關於社會學的類型研究與史學的關係，比較易得的中文作品可參考：拙譯，「歷史學與社會學：若干方法學上的考察」，收入；拙編，史學方法論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六年），頁二三—五七，拙譯，「社會學的類型研究與歷史解釋」，收入：同上書，頁五七—八三；許倬雲師，「社會學與史學」，收入：本書，第十六篇；鮑家麟譯，「作為社會科學的史學——行為與社會科學調查歷史小組之報告摘要」，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國六十年六月），頁一五五—一五九。

⑤ Ingram Byaketer tr., Poetics, 1452 in Richard McK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Lifetime Library), pp.1464-1465。中譯文見：姚一葦譯註，詩學綱註（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六十六年），至八六。

⑥ H.R. Trevor-Roper,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History and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No.42,

(1969), pp.3-17.

Thomas C. Cochra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ynthe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64 (1954):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 Edited in Fritz Ster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Meridian Books, 1956), pp.348-359.

Richard Hofstadter,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p.359-370.

關於韋伯在中西歷史研究上之創見及其影響，筆者已別文介紹，此處不贅。參看：拙著，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問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第一章：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六年）。

參見 Samuel N. Eisenstadt,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Civilization and Revolution," Daedalus, (Fall, 1977):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Vol. II, pp.59-78, esp. p.61. 本節所論多本埃氏之說，特此聲明，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關於埃氏本人之學說，筆者另有一文介紹，參看：拙作，「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解釋」，收入：拙編，史學方法論叢，附錄(2)，頁二〇三—二二七。

徐正光先生對於發展社會學會作詳細介紹。見氏著，「發展社會學——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家對於發展問題的探討」，美國研究，第四卷第四期（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頁五一—八五。

⑫ 參考：S.N. Eisenstadt, op. cit., pp.63-64.

S.N. Eisen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69).

(13) 見：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吾的歷史思想」，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頁一六七—二二一，引文見頁一七〇。

(14) 黃進興先生文中涉及分析歷史哲學家韓培爾(Carl G. Hempel)之學說，有關韓氏學說之中文論著可參考：Carl G. Hempel 著，殷海光譯，「歷史中普遍定律底功用」，現代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七年三月），頁五五—六七，此文係韓培爾氏名著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之中譯；黃進興，「歷史解釋與通則的關係：韓培爾觀點之檢討」，食貨月刊，復刊第四卷第八期（民國六十三年），頁三八—四九；傑瑞·金斯堡著，黃進興譯，「分析歷史哲學對史家的啓示」，食貨月刊，復刊第六卷第七期（民國六十五年十月），頁四三—一四四一；林紀宏，「韓普爾(Carl G. Hempel)對於『歷史解釋』觀念的析清」，史釋，第三期（民國五十五年六月），頁八七—一〇〇。

(15) 見：Arnold J. Toynbee and G.R. Urban, Toynbee on Toynbe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enold J. Toynbee and G.R. Urb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17.

(17) 例如：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四年四版），頁一一十一；徐復觀，「答輔仁大學歷史學會問治古代思想史方法書」，「幼獅月刊」，第二六三期（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頁廿四—廿六；アーサー・ワート(Arthur Wright)「中國思想研究的新方法」，東方學，第十輯（一九五五年四月），頁一三〇—一三七；Benjamin

I. Schwartz 著，張永堂譯，「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入：張永堂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九月），頁一一一〇；王爾敏，「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新知雜誌，第二年第三期（民國六十一年六月一日），頁四七—六四；木村英一，「中國思想史學の對象について」，」收入：木村英一博士頌壽紀念會編，中國哲學史の展望と摸索（東京：創文社，一九七六），頁三一一五；木全德雄，「思想史研究の方法論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收入：木村英一博士頌壽會編，前引書，頁一七一四五。Arthur F. Wright,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 (1960), pp. 233-253。

(18) 見：Edward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翻譯中心，民國五十七年、六十九年），頁一一八一九。

(19) Erik H.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58, 1962); 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New York, 1969).

(20) 參看：Donald B. Meyer, "A Review of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1 (1961), pp. 291-297; Roper A. Johnson, ed., Psychohistory and Religion: the case of young man Luther.

(21) William H. Langer, "The Next Assign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2 (Jan., 1958), pp. 283-304。茲將國內已有中譯，見：卓遵宏譯，「歷史研究的新課題」，近代中國，第十一期（民國

六十八年八月卅一日），頁一八八—一九六。

卓遜宏譯，前引文，頁一九六。

關於一九七五年以前歐美學界之心理史學研究成果最詳盡之書目，參看.. Faye Shofsky et al., "A Bibliography of 'Psychohistory,'" 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 II (1975), pp.517-562, 此一書目發表於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五年以後，則有以下二篇論文亦列舉心理史學之成果.. Thomas W. Africa, "Psychohistory, Ancient History, and Freud: The Descent into Auernas," Arethusa, XII (1979), pp.5-33; Peter Loewenberg, "History and Psychoanaly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sychiatry,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Neurology (New York, 1979), V. Pp.363-374.

最新的書目性的回顧則有本年（一九八〇年）Peter Loewenberg 斯密表譯文 Peter Loewenberg, "Psycho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08-432.

見.. George M. Kiren and Leon H. Rappoport, eds., Varieties of Psychohistory (New York, 1976), p.2, 14, N.2.

Geoffrey, Barraclough, "Psycho-history Is Buck," Guardian (Kanchester and London), March 3, 1973.

Terry H. Anderson, "Becoming Same with Psychohistory," The Historian, XLI (1978), p.1-20.

Peter C. Hoffer, "Is Psychohistory Really History?" Psychohistory Review, VII (1979), p.6-12.

Peter Loewenberg, "Psychohistory," p.432.

曼紐著，江勇振譯，「心理學在史學上的應用與濫用」，食貨月刊，復刊第二卷第十期（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頁五一四—五三一。

溫士坦及柏拉特著，吳瑞屯譯，「理論應用於歷史研究：有關心理分析理論的問題」，食貨月刊，復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頁六二五—六三四。

張瑞德，「蔣夢麟早年心理上的價值衝突與平衡（光緒十一年—民國六年）」，「食貨月刊」，復刊第七卷第八、九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頁七八—八四。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一九七六）。此外，余氏在此一研究題目上尚有論文數篇，均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一書，可參閱。

余英時，前引書，頁六七及頁八十一，註五十九。

一九七七年六月廿六日至七月一日，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在加州召開「清初思想研討會」，日人岡田武彥教授以「戴震と日本古學派の思想——唯氣論と理學批評論の展開」為題宣讀論文，認為戴東原傾向於主知主義。周田氏持論與余英時氏之說相近。徐復觀先生則認為清代漢學不能與西方的主知主義相傳會。見：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大陸雜誌，第五十四卷第四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五日），頁一一二一；並參考：胡秋原，「覆徐復觀先生論漢學宋學及中國學術路向書」，中華雜誌，第一六七期（民國六十六年六月），頁二九一—四一。

參考：張玉法，「歷史研究的量化問題」，收入：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六十八年），頁七三—九三。

③ Lee Benson, "Research Problem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 收入於：氏著 Toward a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 (Philadelphia, 1972), p.3-80.

④ Robert P. Swierenga, "Clio and Computers: A Survey of Computerized Research in History,"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V (1970), p.5. 原文未見，此處係轉引自 J. Morgan Kousser, "Quantitative Social-Scientific History," in Michael Kamma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p.435, note. 5.

J. Norgan Kousser, op. cit., pp.438-439.

Ibid., pp.440-441.

中文論著中有關量化方法的介紹除了註三十四所引張玉法先生論文及本書所收錄的古偉瀛先生論文之外，尚有以下幾篇：

① 古偉瀛，「內容分析之幾種用於研究傳記歷史的方法及其於中國材料的初步運用」，食貨月刊，復刊一卷十二期，頁一一十。

② 古偉瀛，「愛德華·修特的史學與電腦」，食貨月刊，復刊四卷四期，頁一五四—一五六。

③ 馬許著，古偉瀛譯，「中國社會的正式組織與昇遷」，食貨月刊，復刊五卷一期，頁二二三—二二二。

④ 古偉瀛，「C 分析簡介」，食貨月刊，復刊五卷四期，頁十八—一三三。

(5) 芬伯著，瞿海源譯，「歷史學家運用統計技術從事研究的一個例子：計數統計表的標準化」，《食貨月刊》，復刊二卷二期，頁一〇六——一四。

(6) 瞿海源著，「T統計分析簡介：一篇有關清朝官僚研究論文的註解」，《食貨月刊》，復刊五卷一期，頁二十一——二十一。

(7) 艾狄洛特著，康綠島譯，「量化在歷史上的應用及其限制」，《食貨月刊》，復刊二卷六期，頁三二一至三三七。

(8) Francis Furet, "Quantitative History," in Felix Gilbert and Stephan R. Graubard,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1, 1972), pp. 45-61.

(9) 艾狄洛特著，康綠島譯，前引文，頁三三三。

(10) Lee Benson, "Quantification, Scientific History, and Scholarly Innov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IV (June, 1966), pp. 11-16.

(11) 參考：Jerome M. Clubb and Allan G. Bogue, "History, Quan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21, No. 2 (Nov./Dec., 1977), pp. 167-220; Stephen Thernstrom,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istory: Some Notes,"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Richard Hofstadter eds., Sociology and History: Methods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Inc., 1968), pp. 59-78.

(12)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XVII (Dec., 1962), pp. 768-711.

J.H. Hexter, "Some American Observations (on Quantitative Hist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I (Jan., 1967), pp. 17-18.

Oscar Handlin, Truth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

Cho-yün Hsü,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卷十一，小雅·十月之交，頁五下。

春秋經傳集解（四部叢刊本），卷二十六，昭和三十二年，頁十六上。

Cho-yün Hsü,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p. 29. Table 1, p. 30. Table 2, p. 33, Table 3, p. 39.
Table 4.

另參考拙著「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第一章之相關討論及頁二四，註四七所列各篇中外學人所撰書評。

關於新經濟史研究之中文論著，參考：劉翠溶，「近二十年來美國新經濟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美國研究」，第四卷第二期（民國六十四年六月），頁六三一八一。Thomas C. Cochran原作，劉翠溶譯，「美國經濟成長的矛盾」，「美國研究」，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頁八一—九九；勞夫希迪著，劉石吉譯，「經濟史家所走的路」，「食貨月刊」，復刊第三卷第二期（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

五四) , 頁八〇一八七。

- ⑤ John Habakkuk,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in Felix Gilbert et al., eds.,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pp.27-444.

考特著，杜正勝譯，「論經濟史研究」，《食貨月刊》，復刊第七卷第十二期（民國六十七年二月），頁十五。

關於布洛克及其年鑑學派，可參考：夏伯嘉，「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史學評論》，第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頁二二一—二二八。

⑥ 參考 Allan N. Shar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as History and Demograph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21, No.2, (Nov./Dec. 1977), pp.245-262.